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



鸡鸣丛书

朱晓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鸡
鸣
丛
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

朱晓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朱晓进 著.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鸡鸣丛书.第2辑)
ISBN 978-7-02-006726-8

I. 中… II. 朱…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805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Yan Jiu De Shi Yu

朱晓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7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726-8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董 健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始)、南京高师(1915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始)、南京大学

(1949 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上世纪 40 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 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戒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

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阽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文化的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生、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人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在此,“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类)倒是不断出现,也

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话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夫子说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

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得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宋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宋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

——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7年6月22日改定

目 录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3
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	
——略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问题	32
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	41
重读“五四”	50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	
——从 30 年代文学谈起	62
重新进入“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几点思考	73

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研究目的·适用对象·学术规范	85
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	
——《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导言	88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 20 世纪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导论	101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言	115
政治文化心理与 30 年代文学	128
30 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157
从地域性文化特征看“山药蛋派”的历史命运	181

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195
鲁迅与语言文化	213
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	232
30 年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文体特征	247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264
后记	281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 20 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 1904 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最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①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年泰东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1929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②

“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比较盛行。^③ 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最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67页。

②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2页。

③ 关于20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可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进化的观念”一节。

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的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30 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 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① 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的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 1989 年版(据 1934 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订),第 17—18 页。